

## 非洲高等教育的国际科研资助：风险与收益

恩根格·兰森·坦尤

恩根格·兰森·坦尤（Ngenge Ransom Tanyu）：《社会科学电子期刊》（*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主编、非洲在线与出版图书馆（Africa Online & Publications Library）创始人兼执行主任

电子邮箱：[ngengetanyu@africaopl.org](mailto:ngengetanyu@africaopl.org)

对非洲 100 所顶尖大学的分析表明，大学大约 40%—60% 的经费来自非洲以外。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是资助乌干达及其他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与农业研究的诸多重要外部资助方之一；威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为生物医学与公共卫生项目提供经费；欧盟“地平线 2020”（Horizon 2020）为非洲与欧洲高校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提供资助。来自专项资金与合作关系的经费往往附带具体的成果与产出要求。例如：合作研究需在论文上署名合著，并预期由“全球北方”的研究者担任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研究议题需与北方资助方的战略利益保持一致；要求在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论文（而“全球南方”的学者通常获取渠道更为受限）；以及共享知识产权等条款。以“伊拉斯谟+”（Erasmus+）为代表的能力建设项目同样强调对学者的培训与回归本校后的再融入。此类外部资助趋势凸显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引发对非洲大科研发议程自主性与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外部资助是否始终出于善意并聚焦非洲利益？是否真正契合非洲的发展优先领域？它是在提升高校自主性，还是加深依赖循环？本文通过梳理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约翰内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内罗毕大学（University of Nairobi）与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的经费数据，阐释外部资助的运行机制及其对非洲高等教育的影响。

### 肯尼亚与乌干达

内罗毕大学以在科研经费方面高度依赖国际伙伴而闻名。主要资助机构包括由校长帕特里克·费尔科伊恩（Patrick Verkooijen）领导的“全球气候适应中心”（Global Center on Adaptation）。费尔科伊恩教授是“非洲（气候）适应加速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该计划已为非洲带来逾 60 亿美元的弹性投资。尽管他在气候适应领域的专业知识十分宝贵，其担任校长也具战略意义，但其荷兰籍背景与国际网络在非洲公众中传递出矛盾信号。在此种外部影响明显存在于内罗毕大学的情形下，不禁使人追问：当洛克菲勒基金会、三菱公司以及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为内罗毕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提供奖学金时，其代价为何？

马凯雷雷大学认识到科研在解决乌干达国家发展需求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其官网信息显示，2019—2020 财年，学校通过“研究与创新基金”（Research and Innovations Fund）获得特别资助 300 亿乌干达先令（约 810 万美元）。该举措源于校方与乌干达政府之间的战略磋商，旨在支持

高影响力的研究与创新。然而考虑到乌干达政府本身高度依赖外援，这笔资金能否真正产生结构性改变仍待观察。除此之外，学校仅将内部教职工创收的 1% 用于科研，主要依赖与国际发展机构的合作，如挪威发展署（NORAD）、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研究合作署（Sida/SAREC）以及美国纽约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等长期伙伴。校方网站列示的 6 个项目中，仅 1 项由非洲内部资金支持，其余均为外部资助，例如，区域作物改良卓越中心（MaRCCI）获得世界银行 2017—2022 年的经费；Kiira-EV 项目可追溯至 2008 年“车辆设计峰会”，当时由麻省理工学院牵头，汇聚 35 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共同研制五座插电式混合动力车“Vision 200”。由此，马凯雷雷大学堪称高度依赖外部经费与伙伴关系的典型案例：科研能力得到提升，但独立性面临风险。

## 南非的情况

斯坦陵布什大学在 2023 年财报中披露，其“第三来源收入”（主要为外部资助）为 13 亿南非兰特（略低于 7,000 万美元），占学校年度经常性收入的 32.2%；相比之下，第一来源收入（政府补助）仅占 29.6%，第二来源收入（学费）占 22.1%。外部资金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如泰格堡校区耗资 12 亿兰特的生物医学研究院。然而，由于此类外部资助多为项目制且有时间界限，学校在可持续性方面面临挑战。

约翰内斯堡大学在 2023 年同样实现外部科研经费大幅增长：当年科研收入达 9.342 亿兰特，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主要来源于国际资助方，如威康信托以及与金砖国家相关的全球学术网络。外部资助占学校收入的 32.2%，凸显国际捐助者在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等

前沿研究中的关键作用。该校全球合作部 2024 年工作总结显示，学校学术事务部门已成功签署 15 份合作协议，伙伴包括德国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y of Hohenheim）、斯洛文尼亚新戈里察大学（University of Nova Gorica）、芬兰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Bahia）、德国康斯特拉大学（Constructor University）、瑞典马尔默大学（Malmö University）、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智利天主教大学（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以及德国科隆大学（University of Cologne）。然则，历史反复表明：当非洲高校在相对弱势地位下参与谈判时，往往需付出高昂成本。

## 外部资助的收益与挑战

外部资助对于非洲高校的科研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斯坦陵布什大学与约翰内斯堡大学借助外部资金建设了生物医学研究院与 4IR 先进实验室；各类奖学金与基金使成千上万名非洲学生得以攻读研究生课程并开展有影响力的研究。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有助于获取先进技术、全球专长与创新方法，提升非洲研究的国际可见度。众多资助聚焦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与粮食安全等紧迫全球议题，使非洲机构能够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但必须看到，尽管外部资助提供了关键资源，也带来可能危及非洲高等教育自主性与可持续性的风险。资助方常将研究主题优先符合自身利益，而非非洲的核心需求。例如，内罗毕大学全球气候适应中心所获相关资助，可能挤占对城市贫困与治理等紧迫地

方议题的关注。资助协议还常在知识产权与决策权上向资助方倾斜，限制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或公共政策转化。再者，外部经费多为特定项目且周期固定，一旦资助结束，学校便暴露于运营脆弱性之中。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报告指出，在缺乏稳定经费时，科研设施的运行维护面临困难；斯坦陵布什大学对第三来源收入（占比 32.2%）的依赖亦揭示其科研生态的脆弱。因此，对外部资助的高度依赖，使非洲高校易受全球经济波动与资助方偏好变化的影响。

## 走向均衡的资助模式

非洲高校应着力建立更为稳健的校内资助机制并加强区域协作，以降低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各国政府应提高教育与科研在 GDP 中的投入占比。高校还应与本地企业建立合作，拓宽经费来源；通过设立捐赠基金并动员校友支持，提升长期财务稳健性。斯坦陵布什大学与约翰内斯堡大学已开始探索上述路径，但仍需在规模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